

# 新中国对家庭和家庭妇女的媒介建构研究

□ 韩 敏

(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家庭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起点和基本单位,“十七年”是中国家庭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本文探讨“十七年”主流媒体所建构的家庭和家庭妇女形象及其内涵,选取《人民日报》《中国妇女》《人民画报》为样本。研究发现,家庭与家庭妇女形象从50年代的充满悖论到60年代的被消解,这种变迁表明了家庭与家庭妇女逐渐被主流价值体系所放逐,消解了家庭的社会细胞功能,这是“十七年”妇女解放运动的未完成性。因此,在当前家庭道德的重建中,将家庭与家庭妇女的劳动纳入到社会价值体系,是当前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家庭;家庭妇女;道德重建;人民日报;中国妇女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6.12.024

[中图分类号] C9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6)12-000-07

## 1 问题的缘起

2014年是中国的家庭年。2014年5月14日国际家庭年2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报告阐明了家庭的重要社会地位,梳理了60多年来中国家庭发展的脉络、现状,展望了家庭的发展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发起,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专家评选出了“2014年十大家庭事件”,“主流媒体挖掘民间家风,形成家庭文化传承的舆论热点”是其中之一。2015年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述了“家”的重要性,提出要重视注重家教、家风、家庭建设。2015年6月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了《我有传家宝》节目。学界也开始关注家庭研究,甘阳提出当前中国的道德重建的基本单位应该是家庭,“我认为最基本的问题在于,要应该明确确定中国基本的道德单位是家庭。以家庭为中心,是一个比较能有效克制恶性个人主义发展的基础。”<sup>[1](P18-19)]</sup>面对西方以个体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重视家庭建设、重视家风与家教的传统,这是中国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观念。因此家庭应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

重要场域。

建国60多年来,这是政府第二次明确提出重视家庭建设,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50年代的新政权建立、60年代的政治运动、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21世纪初的全球化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这些政治变革、社会变迁和媒介技术发展对家庭结构与观念带来了深刻影响。近年来学界针对这些历史节点,就国家权力与家庭结构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加·朱爱岚,1994年)、《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加·宝森,2003年)、《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阎云翔,2006年)。这些学者采用民族志、社会调查法等,围绕中国社会变迁与妇女解放、家庭结构的关系等议题研究,尤其是对土地制度、妇女生活方式与性别意识的地区化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学者以翔实的调查资料显示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于农村妇女生产劳动、家庭地位和社会身份的影响。

梁景和主编的《婚姻·家庭·性别研究》(2012年)是近年有关家庭文化研究的代表作,该文集收录了对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重大科研项目(SWU1309367)。

作者简介:韩敏(1970—),女,四川资中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于新中国初期的家庭文化(《新中国家庭文化的演变》,李静,第1辑)、家务劳动(《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究——以〈中国妇女〉为中心(1949-1966年)》,张弛,第2辑)、妇女工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女工研究》,孟丽媛,第2辑)、家庭关系与家庭教育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地区家庭关系与家庭教育研究(1949-1966)》,李兴锋,第3辑)等。《新中国家庭文化的演变(1949-1966)》(李静,第1辑)认为新中国家庭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作者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供需发生偏差的时候,国家总是首先鼓励妇女回到家庭,赞颂“社会主义家庭妇女”,主流意识形态也只认可那种承担了家庭与社会双重责任的妇女,“我国与其说是重新定义了妇女的角色,不如说是扩大了妇女的角色。”<sup>[2](P93)</sup>郭于华以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了陕北驢村农业合作化对于妇女的身份认同,她认为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妇女从家庭走向田间,“这一过程其实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是从家庭与宗教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的过程。”<sup>[3](P90)</sup>郭于华的田野研究呼应了戴锦华对“十七年”电影的女性形象研究。戴锦华认为“十七年”的“花木兰”式的女性电影形象,在表达对党、国的认同与志忠至诚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后。”<sup>[4](P88-89)</sup>两位学者从本质主义的角度揭示了新中国初期中国女性面临的身体与精神的困境。然而,在笔者看来,新中国初期,从个体的、社会的人成为国家的、单位的、集体的人,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共同的生存语境,而不是女性所独自面对的问题。因此,两位学者其实是以普遍性的问题遮蔽了女性性别的问题。

加拿大政治学学者 Kimberley Ens Manning 在《女人工作的性别政治:大跃进时期的激进主义的再思考》一文中研究了大跃进时期,作者以河南和江苏为案例,研究了大跃进期间扩大的社会福利设施与强大的性别平等话语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中央对于妇女的大众动员的强大影响力,妇女不仅欣然接受了动员,并且还以劳动模范为标准来规约自己,她们忽视了其健康和安全的,作者认为,大跃进的激进主义的行为颠覆了中共长期以来的保护妇女生殖和生理健康的政策。<sup>[5](P72-107)</sup>华盛顿大学从事历史与中国研究的 Patricia Buckley Ebrey 教授认为中国家庭、亲属关系、性别体系至今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作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有一些

显著的连续性。<sup>[6](P6)</sup>墨尔本大学的学者 Anne E. McLaren 在《中国妇女:生活与工作》的序言中指出,1990年代到21世纪,经济改革和全球化对中国妇女在家庭事务、管理和职业和色情行业与家庭服务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对婚姻改变、消费欲望和国内空间的再造。对当代妇女工作变化的定义提供了新的见解,认为当前中国妇女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当前的生产阶级中的“劣势”地位。<sup>[7](P1-11)</sup>诺丁汉大学的学者 Sally Sargeson 考察了浙江年轻妇女们的愿望以及关于新居的渴求对于乡村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剖析了农村房地产对于家庭空间建构的影响,以及在其中妇女地位与影响力的改变。作者认为年轻妇女的婚姻需求影响了家庭财富的传承和住房的支出方式的变化,这些需求也反映了女性努力获得在家庭中的自治和控制地位。<sup>[8](P157-159)</sup>

在当前中国妇女与家庭的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偏重于家庭的宏观研究,缺乏个体研究纬度;重于社会结构的研究,弱于微观家庭行为的研究;偏重于男性视角的研究,忽视女性经验的审视。<sup>[9](P1-2)</sup>Patricia Buckley Ebrey 教授认为,妇女历史研究的学者往往受到人类学模式的影响,他们讨论中国家庭的时候总是以中国历史作为背景,而不是将妇女发展作为历史叙事的主要组成部分。<sup>[10](P1)</sup>当前学界对20世纪50年中国妇女生活发生重要变迁的历史时期的研究中,鲜有从媒介角度研究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建构家庭与家庭妇女。因此,本文选取1949年到1966年期间的主要媒介对于家庭和妇女的相关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媒体是如何建构家庭以及家庭妇女。对于该论题的研究,可以弥补当前对于家庭空间中的女性行为与观念研究之不足。另一方面,从媒介角度切入对新中国的家庭与家庭妇女的研究,可以展现家庭与家庭妇女的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的建构观念,也可以展现日常生活领域内的家庭状况与家庭妇女的自我认知,以及探究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如何重构家庭空间。

## 2 研究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妇女从家庭走向了工厂与田间,妇女开始从某氏转变成成为某单位或者农业合作社的成员,妇女从事具有薪酬收入的劳动是否会影响到家庭地位和家庭角色的变化?基于这些问题的驱动,本文选取1949年到1966年的《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

国妇女》的家庭妇女、家庭的相关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三份报刊分别代表了新中国初期的主流政治媒体、妇女专业性媒体、海外传播媒体。

本文从两个维度选取研究样本,首先,关注《人民画报》《中国妇女》封面对家庭妇女的形象建构。《中国妇女》有封面人物 105 份,符合本文研究目标的妇女人物封面有 94 份。《人民画报》合计出版 198 期,符合研究目标的妇女人物封面有 46 份。

其次,关注《中国妇女》《人民日报》的家庭与家庭妇女的文字报道文章。运用等距抽样方法对《人民日报》有关妇女人物报道进行样本选取,具体方法是从 1949 年 1 月 1 日开始,间隔 10 天抽取一份报纸,合计抽取了 620 天的报纸,在抽取出来的报纸中,按照标题进行议题判断,获取了 91 篇妇女人物报道文章。对于《中国妇女》,本文选取了该杂志在 1955 年和 1963 年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力的专题讨论文章作为研究样本,即 1955 年的“家庭妇女应如何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1963 年的“女人活着为什么”。所选取的样本既可以呈现新中国初期普通读者对于家庭和家庭妇女的自我认知状况,也可以反映媒体对于家庭和家庭妇女的建构观念。

### 3 家庭与家庭妇女的总体性地位:被忽视的生活空间和被遗忘的群体

新中国初期《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妇女》关于家庭与家庭妇女的报道的频率以及数量来说,都是属于偏低的,这表明家庭和家庭妇女不是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重点议题。首先,《中国妇女》和《人民画报》的妇女封面人物的比率分别是 43%、23%,这表现了妇女专业性杂志与国家画报对妇女议题关注度的差异。其次,两份杂志的妇女封面人物出版数量峰值都出现在 1961 和 1962 年,表明了两份杂志对妇女人物关注的时间节点基本一致。再次,研究者对两份杂志的封面妇女人物出现场域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中国妇女》《人民画报》封面女性出现场域统计表

出现场域	家居环境	工作环境	公共场所	其它
《中国妇女》N=94	1%	70%	12%	17%
《人民画报》N=46	7%	57%	17%	17%

从封面女性出现的场所来看,她们出现在工作环境的最多,表明了两份杂志都主要着力于建构在工作环境中的劳动女性。她们出现频率最低是家居环境。相比之下,《人民画报》关注家庭领域的女性比例稍高于《中国妇女》,而且两份杂志在表现家庭环境中的女性的主题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

《中国妇女》的封面对于出现在家居环境中的女性都采取了政治化的建构策略。比如 1960 年第 17 期的封面人物是黑龙江省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毛洪华,图片表现她坐在书桌旁边,正在阅读毛泽东著作。1961 年第 11 期的封面《晋剧艺术家冀美莲与女儿冀萍》,这份封面表现了晋剧女演员冀美莲向女儿冀萍传授表演技艺,在这种艺术传授中两个人的关系更多凸显的是艺术传承关系,也就是工作关系,她们的母女关系则退居其次。《中国妇女》虽有这两份与家庭和家庭妇女相关的封面,然而封面所表现的主题都消解了家庭和家庭妇女的内涵,出现在书房的毛洪华,主要表现为她在家庭中的政治学习状况。晋剧艺术家冀美莲和女儿冀萍的封面表现的母女之间的艺术传承,这是工作关系的呈现。因此,两份封面都采取了家庭生活的政治化、社会化的建构策略。

与《中国妇女》对家庭和家庭妇女的政治化、社会化的建构策略相比,以国际传播为目标的《人民画报》则采取了正面表现家庭与家庭妇女的建构策略。比如,1955 年第 1 期封面《天津第一橡胶厂的职员李淑华和她一胎所生的三个孩子》,展示了一位女职工作为母亲的形象,歌颂了母爱。《人民日报》的 91 篇妇女人物报道,具体统计结果如表 2:

表 2:《人民日报》国内妇女人物报道的职业统计情况<sup>①</sup>

职业	家庭妇女	农民	工人	知识分子	军人
N=93(篇)	13(14%)	22(24%)	39(42%)	12(13%)	7(8%)

从《人民日报》的妇女人物报道所涉及的职业来看,这个时期主要以建构城市职业妇女和农村劳动妇女形象为主体,主要建构了社会空间中的妇女形象。从《中国妇女》《人民画报》封面以及《人民日报》对于家庭和家庭妇女表现的频率以及内涵来说,新中国初期的家庭领域和家庭妇女则是显然不是主要议题,这是一

<sup>①</sup>由于有些文章表现了报道人物的两种职业,其中有两篇报道对一个人物的两种职业进行了重复统计。

个被忽视的空间和被遗忘的群体。

#### 4 家庭与家庭妇女的建构观念：从肯定到否定

从1949年到1966年,《人民日报》《中国妇女》家庭与家庭妇女的新闻报道,都呈现出不稳定的建构观念。1957年之前的《人民日报》关于家庭以及家庭妇女的报道,建构了“社会主义家庭妇女”形象,认可她们是家庭和家庭妇女是社会生产的后盾力量。比如《“好母亲”——记模范军属王老太太》(《人民日报》1949年5月11日),王老太太是某部司号长王振章的母亲,报道突出了王老太太告诫、鼓励在部队服役的儿子要积极向上,也表现了作为母亲的王老太太在家乡也是一位劳动能手和党的好宣传员:“她和儿子之间,不仅仅是母子之爱,同时还渗透着浓厚的同志之爱。”新闻报道建构了“同志”、“党的宣传员”的母亲形象。因此,以母亲为代表的家庭妇女形象是被消解了其本质内涵的“同志”和“宣传员”。

##### 4.1 1955年的讨论:“社会主义家庭妇女”

如果《人民日报》强化了家庭妇女的政治形象和社会生产者形象,将家庭视为社会生产的后盾,1955年《中国妇女》发起的“家庭妇女应如何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讨论,张扬了妇女作为是生产力再生产形象的重要性,将家庭劳动视为社会生产力量。一位养育了6个孩子的家庭妇女的信件引发了这次全国性的讨论,本次讨论历时5期,发表了15篇文章。作者李静芬是一位家庭妇女,丈夫是铁路工人。李静芬的日常工作就是做家务和照料6个孩子,同时还承担了街道服务工作(没有报酬)。当她看到昔日的高中同学在工作中做得有声有色,具有高中学历的她,面对未来,产生了困惑。

首先,从讨论文章来看,社会认可家庭妇女的存在,明确了家庭妇女的社会价值,认为家庭妇女的劳动是一种社会生产。一位男性读者谈到了妻子的家务劳动保证了自己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sup>[11](P12-24)</sup>有读者批判了轻视家庭妇女劳动价值的观点,妇女的家务劳动只是社会工作的不同分工,比较客观理解了妇女解放的思想:“妇女,尤其是没有文化的妇女,不分析具体情况,一律必须参加机关工作,才能获得平等和解放,说家务是‘无聊’,说家庭妇女‘被埋没’等等都是错误

的。”<sup>[12](P13-14)</sup>

其次,讨论文章建构了“好妈妈”形象。讨论文章所描述的好妈妈、好家庭主妇一般都育有2个以上的孩子,最多的则生育了8个孩子。“好妈妈”的“好”不仅体现在教育孩子,为社会培养未来生产者方面,也体现她要学习,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等。

最后,“编者按”和杂志社的总结文章阐述了“社会主义家庭妇女”的社会价值,认为家庭妇女也应该加强学习,等待参加社会生产;家庭妇女还应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形成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和家庭的利益。<sup>[13](P18-36)</sup>

《中国妇女》此时所体现出对家庭和家庭妇女的认识,比欧美的女权主义理论还更早认识到家庭妇女与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她们致力于解决妇女的家庭形象的社会化和家庭劳动的社会价值。比如达拉·科斯塔(Dolla Costa,1972年)和盖伊·图宾(Gayle Rubin,1975年)认为妇女的家庭劳动不仅创造了使用价值,更主要是创造了剩余价值:“妇女正是通过再生产劳动力介入到创造剩余价值——资本的必要条件——的过程中的。”<sup>[14](P108-112)</sup>然而,这个时期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仅仅被主流意识形态在短暂时期内得到观念上的认可,并未在实践的经济体系中得到体现,并且这种观念在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迅速瓦解。

从1955年的《中国妇女》的大讨论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家庭妇女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所遭遇的身份焦虑,“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经济的、政治的等诸多因素逐渐解体,社区子民开始了向国家公民的身份转换,这种身份转换是世界历史上最悲壮、最坎坷的人类进化,其转换之艰难,之曲折,之不可确定性,之难以自主是空前的。”<sup>[15](P113)</sup>

##### 4.2 1963年的讨论:被放逐的家庭与家庭妇女

如果说1955年的“家庭妇女应如何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讨论建构了家庭妇女的社会形象,赋予了家庭妇女的社会与经济的价值,然而在1963年的“女人活着为什么”的讨论则消解了家庭妇女的社会价值。1963年第4期《中国妇女》发表了《谈革命妇女的人生观:记区梦觉同志谈话》《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引起了这次全国性的大讨论。1964年6

月,中国妇女杂志社还将讨论文章结集出版。由此可见,《中国妇女》杂志社对于这次讨论的高度重视以及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力。这次讨论批判了那种满足于相夫教子和建设小家庭的观念,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女干部如何处理工作与家务劳动的关系。

参与本次讨论的读者37位,合计发表39篇文章。尽管本次中心的话题是妇女干部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如何选择,这个话题不仅吸引了妇女干部参与,许多普通的职业女性也积极参与话题讨论,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具有普遍性。21位读者表明了婚姻状况,仅1位读者是离异,仅约占5%;7位读者育有1个孩子,7位读者育有2个孩子,6位读者育有3个以上的孩子(其中有3位读者生育了5个孩子),1位读者尚在孕期。由此可见,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女性读者大多数都生育了2个以上的孩子。因此,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养育孩子是她们在工作和家务之间产生困惑的主要原因。讨论文章主要呈现了以下问题:

第一,讨论文章所呈现的“谁做家务?”情况的分析统计。22位读者在讨论文章中谈及家务劳动的情况,11位读者表明是妻子做家务劳动,8位读者表明是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劳动,2位读者表明是由老人和保姆分担家务劳动,其中1位读者认为应该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从读者的讨论文章对于家务劳动的分配情况来看,50%的女性完全承担了家务劳动,36%的家庭是由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由老人和保姆分担家务劳动比例非常小。由此看来,部分城市男性开始分担家务劳动。总体来说,女性承担了主要家务劳动,男性的家庭角色形象依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可见,尽管女性参加社会生产,但她们的家庭形象依然没有变化,即使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读者也是秉承了这种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观念。从讨论文章中显示的夫妻在家务劳动的分配情况可以得到验证,大部分已婚女性实际上承担了主要的家务劳动,她们在观念上也认可在家庭中的传统性别角色。<sup>[16](P41)</sup>“妇女全职参与有偿劳动的现象并没有反映出男性参与无偿家务劳动的情况。虽然官方上讲,妇女被认为是完全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公民,但她们沉重的家务劳动构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现实。”<sup>[17](P202)</sup>

第二,如何理解工作事业与家庭的关系。27位读者表明了“工作事业第一”的观点,这是多数人的观点。

3位读者表明了“家庭、丈夫孩子第一”的观点,这是少数人的观点,都受到其他读者的批判,也受到杂志社总结文章的批判。

第三,关于解决工作与家务劳动矛盾的方案。尽管有27位读者(占69%)选择或者赞成“工作事业第一位”的观点,她们也表明工作、事业与家务劳动之间存在尖锐矛盾,26位读者的解决方案都是归结于革命思想与觉悟的养成来超越这种矛盾,仅有1位读者提出了现实层面的解决方案,即为了减少家务劳动,夫妇决定只生1个孩子。<sup>[18](P39-40)</sup>

汉学家汤森与沃马克认为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共对家庭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大跃进’,中共试图通过明确地反对家庭来使家庭的传统权力中性化。”第二个阶段则是“大跃进”时期,“它向核心家庭结构本身发出了短暂挑战。”在全面集体化时代,家庭有可能存在与国家利益抗衡的家庭利己主义。第三次则是三年饥荒时代,“三年农业欠收的实在威胁”使中共将家庭“看作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可能盟友”。<sup>[19](P141-142)</sup>女性主义学者杜芳琴认为,“十七年”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打散’了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基础,但消费和维持‘再生产’的功能并没有消失,在性别分工上立法和意识形态的宣传似乎从未对传统的内外分工有过质疑,相反,妇女的家庭角色一直没被‘淡化’,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强化,加重了妇女双重角色的紧张。”<sup>[20](P106-111)</sup>近年来,有学者谈到了职业女性的“角色过载”问题,“职业女性在角色上的‘双全’追求,在职业上接受男性的价值评价标准,在家庭中依旧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因而不由自主地受制于男性价值坐标体系。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新的期望与传统性别观念同时并存,这种男女不同角色期待,自然会增大女性在心理上、思想上的压力,形成女性双重角色的冲突。”<sup>[21](P236-237)</sup>1963年的“女人活着为什么”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女性这种双重角色焦虑的表达。

1955年《中国妇女》发起的“家庭妇女应如何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讨论,肯定了家庭妇女的社会价值,1963年的“女人活着为什么”的讨论,则否定了家庭妇女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价值,这也表明女性留在家庭生活空间的可能性越来越少。对于这种双重负担,1963年的讨论并没有提供实践层面的解决方案,而是将其纳入到思想观念的层面,希望女性依靠革

命意志来超越两者的矛盾,这实际上是将家庭妇女劳动的社会价值虚化。妇女的家务劳动价值的虚化,在家庭妇女走出家庭没有减少体力与精神付出的条件下,这实际上就削减了女性在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评判体系从整体上将妇女群体劳动价值矮化,在本质上消解了家庭与家庭妇女的社会价值,从而彻底放逐了家庭与家庭妇女。

## 5 结语:家庭与家庭妇女的社会化路径

对于20世纪5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对家庭与家庭妇女充满悖论的建构观念,以及60年代采取消解的建构策略,学者们较多地从政治与文化层面进行阐释,笔者也认为它们确实能够阐释一定层面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如果从横向角度审视美国二战前后的女性媒介形象,她们也呈现出前后截然不同的媒介形象。美国“50年代的女电影明星们要么是可爱天真的和没有个性的,如戴比·雷诺兹和多丽斯;要么则表现出一种由天真和挑逗性的性感的复杂的混合。如玛丽莲·梦露。”<sup>[22](P224)</sup>媒体“弥漫着对家务的强烈兴趣”。<sup>[23](P237)</sup>二战期间,弥漫于美国媒体的都是“茱王罗茜”的形象,“妇女们穿着男式服装:裙子很窄;制服也很流行;装着垫肩以显精神。”<sup>[24](P224)</sup>二战前后大相径庭的美国妇女媒介形象,与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的从肯定到否定的家庭与家庭妇女形象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共同的逻辑。对于这个问题的阐释,如果仅仅归因于政治与文化的因素,似乎并没有呈现问题的全貌。如果从经济的纬度来解释,媒介形象的建构与经济生产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呈现。

美国学者埃文斯是比较早从这个纬度解释媒体建构妇女策略。她指出战争结束后,媒体顿时就停止了对“罗西”的宣传,开始引导妇女经营“胜利后的家园”。当时的民调显示,80%以上的军工厂女工不愿意放弃工作,最后,大部分“罗西”还是被解雇了,坚持留下来的只能做一些收入极低的工作。<sup>[25](P248-259)</sup>1950年代中期对于家庭妇女形象的社会价值的认可,与当时对人口再生产的增量需求和减轻就业压力有紧密的关系。当时“人口多就是好”是主导性观念,再者,低下的经济生产水平无法容纳较多的劳动力。因此,部分妇女留在家庭,一方面可以解决人口增量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就业压力。1960年代,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

社会压力已经逐渐显现,1964年国家建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表明了政府开始认识到控制人口的必要性。此时,对于家庭妇女形象的否定,与当时的主导性政治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与那个时代的人口观念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新中国初期的媒体对家庭与家庭妇女的建构,经济是很显著的动因。当人口增长成为社会压力时,淡化母性职责也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经济策略。

尽管中国女性的职业意识已经很普遍,由于各种原因留在家里的妇女依然是一个庞大的人群。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中国的家庭妇女有近7300万,也就是中国每7个成年女性,就有1位是家庭妇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女性加入到这个群体,但总体来说,家庭妇女是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sup>[26](P31-36)</sup>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致力于改变父权话语体系下的生产劳动的内涵,不仅要把女性的“非生产性劳动”都纳入价值体系,而且也要把所有形式的女性劳动纳入到社会权力系统。<sup>[27](P61)</sup>直到今天,女权主义学者的理论成果依然没有出现在媒体对女性形象的表现中,对于家庭妇女形象的社会价值表现的缺席,是对女性的社会价值的虚化,这依然是一种对女性的隐形压抑机制。“它在有价的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内肯定女性的人的价值,却将无价的人的存在和繁衍摒弃于价值领域之外。而这种残缺的价值尺度,扎进仍然戴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桂冠。”<sup>[28](P45)</sup>

由此看来,妇女解放之路并不在于“走出去”或者“回家”,女性真正解放之路或许应该“走出去”或者“回家”具有选择的自由,并且社会体系为这种选择自由提供了价值基础。“如果私人领域中的照护责任(caring responsibility)这样一种公民身份价值得到认可的话,如果这些责任在两性之间得到更为均等的分配,男、女公民身份的内容将会丰富起来。”<sup>[29](P183)</sup>性别平等的前景则是女人和男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生活空间,并且都被可以纳入到社会生活体系之中,家庭也才真正纳入到社会体系。

### 参考文献:

- [1]甘阳.以家庭作为道德重建的中心[J].金融博览,2013,(12).
- [2]李静.新中国家庭文化的演变(1949-1966)[A].梁景

- 和主编.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1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3]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驢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J].中国社会科学,2003,(4).
- [4]戴锦华.性别与叙事: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A].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5]Kimberley Ens Manning: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Woman-Work: Rethinking Radicalism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Eating Bitternes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EDITED BY KIMBERLEY ENS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2011).
- [6]Patricia Buckley Ebrey: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Chinese History, first published 2003 by Routledge, 11 New Fetter Lane, London EC4P 4EE.
- [7]Anne E. McLaren: Chinese Women—Living and Working, first published 2004, by Routledge Curzon.
- [8]Sally Sargeson: Building for the future family, Chinese Women—Living and Working, First published 2004, by Routledge Curzon.
- [9]唐灿.近期国内家庭研究的理论与经验[D].//家庭与性别评论: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10]Patricia Buckley Ebrey: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Chinese History, First published 2003 by Routledge, 11 New Fetter Lane, London EC4P 4EE.
- [11]李荣辉.爱人辛勤的劳动帮助了我[J].新中国妇女,1955,(6).
- [12]刘钊.轻视家庭妇女的思想是错误的[J].新中国妇女,1955,(6).
- [13]本刊讨论总结.家庭妇女应当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J].新中国妇女,1955,(10).
- [14][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15]李培林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 [16]富穗.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女人活着为什么?[M].北京:中国妇女杂志社,1964.
- [17][英]露丝·里斯特.公民身份:女性主义视角[M].夏宏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 [18]姚晓年.建设事业吸引着我[G].//女人活着为什么?北京:中国妇女杂志社,1964.
- [19][美]汤森·沃马克.中国政治[M].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
- [20]杜芳琴.妇女研究的历史语境:父权制、现代性与性别关系[J].浙江学刊,2001,(1).
- [21]杨凤.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22][23][24][美]美洛伊斯·班纳.现代美国妇女[M].侯文蕙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 [25][美]萨拉·M·埃文斯.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M].杨俊峰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 [26]刘爽,马妍.传统与变迁:透视中国的“家庭妇女”[J].妇女研究论丛,2009,(3).
- [27][加]文森特·莫斯科.传播政治经济学[M].胡正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28]李小江.性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 [29][英]露丝·里斯特.公民身份:女性主义视角[M].夏宏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责任编辑 梅瑞祥